

徐道鄰著

敵乎？友乎？

中華民國廿四年春



578.231
952

目 錄

- 一 引言……中日間的僵局
- 二 就中國立場說明僵局延長之利害
- 三 爲日本打算說明僵局延長之利害
- 四 中國方面之錯誤與失計
- 五 日本方面的錯誤(一)……直接的對中國認識之錯誤
- 六 日本方面的錯誤(二)……間接的舉措上的錯誤
- 七 中日兩國所應認識之要點及應採之途徑
- 八 結論……解鈴還須繫鈴人



3 0477 0762 9

979166

敵乎？友乎？

徐道鄰

中日關係的檢討

一 引言——中日間的僵局

世上論述中日問題的論文，已經很多，就是中日兩國政治家及學者所發表的意見，門的或一般的，也已經不少。但我敢斷言一句，兩國公私各方對於中日問題的見解，真能從國家終極的利害上打算，不為感情或客氣所驅使，或一時錯誤所蒙蔽的，實在太少。我們至少可以說，對於問題正面的認識，實在太不夠。國際間許多悲劇，都是起因於一時毫厘之差，致釀成萬劫不復之禍。為打開中日兩國徬徨的僵局，免使愈走愈趨絕路，也為確奠東亞和平，消弭世界戰機起見，對於中日問題，實在有作一番忠實的檢討，無禁忌無隱諱的下一番坦白的批判之必要。

我不是一箇研究國際政治的專家，本文之作，完全在根據常識和事實，而作一種純客觀的真實事理的指陳，以供中日雙方的反省。凡是一般政治家和學者所已經論到的，我無須贅言，但一般所忽畧或有所避忌而不言的，此文將傾量盡述而無所隱飾，知我罪我，聽諸讀者。



首先我敢說，一般有理解的中國人，都知道日本人終究不能作我們的敵人，我們中國亦究竟須有與日本携手之必要。這是就世界大勢和中日兩國的過去現在與將來（如果不是同歸於盡的話）徹底打算的結論，我想日本人士中間懷抱同樣的見解的，當亦不在少數。但是至今為止，不但沒有打開僵局，以更新兩國關係的徵象，而且也找不到一點曙光，只是苟且遷延，得過且過，任令自然變化。人類已進步到了二十世紀，還不能直認事實，而却是遮遮掩掩的缺乏勇氣與真誠，真令人大惑不解。

二 就中國立場說明僵局延長之利害

就中國方面說，現在支配中國政治的是中國國民黨。國民黨應該崇信中山先生的遺教，是沒有疑義的。中山先生曾經說「如果東亞沒有日本，中國早已被人瓜分或共管了」他又說「從日本動員之日起，開到中國攻擊之日為止，最多不過十天，中國假若和日本絕交，日本在十天以內，便可以亡中國。」（民族主義第五講）其他證明中日兩國輔車相依，合則兩利，敵則兩敗的話，散見於各種講演文件的還很多。本來從世界大勢來看，如果中國從遠大的將來着想，中日兩國便應該相互提携而沒有交惡到底的理由。現在雖然有許多國民，激於當前的仇恨，頗有願與日本偕亡的氣慨，但中國國民黨的當局，既然自任以全國安危之重，便應該從大處着想

，堂堂正正的有忠於國家利害的打算。我們固然知道中日問題主動完全在日本，當日本無意緩和時，中國無法單獨緩和，但依目前所標榜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政策，實在不足以表示當局的無辦法。現在更有一類人，懸想到俄日或美日開戰時，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時，中國將何以自處，因而有主張中國應絕對不參加戰爭且實行嚴守中立的。殊不知戰端一啓，中國決沒有守住中立到底的可能，最可能的立場，大約將不積極的站在那一方，而是反對那一方面，或者可以說有那一方面強迫我們或破壞我們中立的時候，我們便不恤犧牲的反抗他。但這樣仍然是與加入戰團無異，這樣不能保持中立而處於被逼參加的被動地位，於中國並沒有何種的利益，而且必陷於最悲慘的絕境。所以我說與其說嚴守中立的話，還不如說是準備犧牲參加戰爭，若要說是站在那一方來參戰，毋甯說是反抗那一方面之爲當。因此可知中國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守住中立，或希望於中取巧，得到什麼利益，就無異於癡人說夢。我以爲目前中國，只有盡力消弭戰機，纔是唯一可採之路。而欲消弭戰機，至少須將足爲引起戰機原因之一的中日問題，求得一個解決。中日問題解決了，世界局勢將爲之一變，俄美與日本間之戰爭或者可以不發生，即使還有俄日或美日戰爭，在中國也可以有清清楚楚的立場，自由應付，而不受絲毫的牽掣。所以無論由中山先生的遺教及國家永久利害上着想，或是爲因應現在國際間局勢着想

，中國方面斷乎不應聽任中日僵局無期延長下去，而不謀解決之道。

三 爲日本打算說明僵局延長之利害

再從日本方面說，自九一八以至於現在，自內田以至於廣田，自從侵佔東北四省，其後退出聯盟，乃至去年四月十七日強硬的聲明，以迄於最近，雖然中間一再有「增進及維持東亞和平」之口頭的標榜，但所作所爲，無不是增重東亞和平的危機，而且積極逐行其對華強硬之政策，始終沒有改變的跡象。我們固然知道日本既然在三年以前向中國向世界投下如此驚人的一顆炸彈，現在已欲罷不能的在某種理想之下，逕行直遂的走去，彼國的政治家及軍部，自有其對世界對中國的打算，或者其自身的計劃已很周詳，但我們局外靜觀，至少就日本對中國所取策畧而言，可以直言日本的打算並不是算無遺策。論到日本對中國關係，我們必須將其對俄對美（與對英）之錯綜關係連帶並論，蓋在一方面，因爲日本欲逐行其大陸政策，與獨霸太平洋的理想，打倒勁敵，混一東亞，所以引起俄美的嫉視，在另一方面，日本當局所持以欺騙其國民者，謂如不取得滿蒙，無以解除日本國防安全之威脅，換言之，就是日本爲對俄對美備戰，所以必須侵畧滿蒙。我們現在也以純客觀的態度替日本打算一下，國際上無論在戰畧政畧上說，正面以外，當然應該算到側面和背面，側背方面如其有了對敵，這對敵的兵力如果運用得法

。就可以當得過正面二倍三倍甚至十倍以上的效力，這是世上無論任何政界家或戰界家所了然無疑的。現在日本如欲東向與美國啓釁，中國即在其背面，如欲北向與蘇俄開戰，中國即在其側面，所以日本如欲對美對俄備戰，如不消弭側背方面的顧慮，豈但沒有制勝的把握，直無開戰的可能。但消弭側背方面顧慮的方法，本來也有兩途，一種是以力量絕對控制住這個隣國，使無能爲患，一種是與這個處在側背方面的隣國結成協調關係。現在日本人既不從協調方面與中國提携，則日本的打算，顯然是採取以強力控制中國的辦法，然日本能否絕對達到控制中國的目的呢？而且以我們所見，中日兩國既已交惡到這般田地，只控制中國也還不是辦法，而必須在對美或對俄開戰以前澈底滅亡了中國，且必須是在三個月以內完全佔了中國，在半年以內澈底滅亡了中國；若日本不能如孫中山先生所說，十天以內滅亡了中國，則日本地位甚爲危險，因日本滅亡中國的時間，如要用三個月或半年的期間，則美或俄必不能坐待日本之從容對付中國，而將迫日本以速戰，然而我們就事實觀察，日本佔領東北，已有三年之久，不但東北義勇軍尚不能消滅，而瀋陽一縣的民間槍械，何嘗能如期繳清？由此事實推斷，日本畢竟能否在最短期間，如十天以內，澈底的控制中國甚至滅亡中國呢？至於中山先生何以明言日本在十天以內可以亡中國？要知中山先生之言，是看破日本早具有十天內佔領中國要地之野心與其可能

，故特加重其詞，以警惕國人，彼亦何嘗不明知日本只能於十天之內佔領中國重要交通地區，而不能滅亡中國四千五百萬方里之土地，與四萬八千萬之人民，吾人既明此意？則可就種種之事實與情勢上觀察日本有無徹底控制中國或滅亡中國之可能？

(一) 就控制中國來說，日本當然要先以海軍力量封鎖中國的海岸，但中國現在尙處於次殖民地的地位，歐美各國對中國有錯綜的政治經濟的關係，尤其是英國的關係爲更切，豈止關涉一二國的利害而已。日本如欲如此做去，將不止與中國爲敵，不止與俄美爲敵，而且強迫英國以及全世界作敵人。控制中國海岸本來爲對俄或對美作戰之便利，但在主戰沒有開始以前，便擴大敵對範圍到全世界，是否爲有利之戰畧？這是就海上說。

(二) 在陸上方面，我們可信日本所積極打算中者，即爲造成第二第三的「滿洲國」，亦即一般所傳，將擴大侵佔範圍，以造成所謂「華北國」或「蒙古國」但此是否爲日本力量所容許呢？先就經濟方面來說，日本自出兵滿洲以至造成「偽國」以來，所支出的軍費有多少的數額，這是世人所共知的，其國內財政上赤字數額的繼長增高，也是世人所共知的。現在如擴大侵佔範圍，須知經畧華北決不如強佔東三省時可以唾手而得，一則當時事起無備，二則華北之民氣民力與人民知識程度，又與東三省久處日本勢力之下，精神上早受影響者不同，日本如真

欲在華北或蒙古造成其意想中之第二第三的傀儡組織，所消耗的兵力與支出的費用，視前必以倍計，而如內蒙一帶，遍野荒涼，既鮮生產，毫無收入可言，強欲經營，倍多費用，此就其直接經濟影響而言。在間接影響說，日本如必欲更進一步擴大侵略範圍，中國國民的抵貨運動，將非任何力量所能抑制，彼時日本在華是否尚有商業或其他產業可以立足，也就不難想像。再就軍事及所需兵力而言，先以「滿洲國」為例，日本駐在「滿洲國」的軍隊，表面上說是五個師團，實際我們知道在十萬人以上，有十萬以上的軍隊，至今尚不能確保所謂「滿洲國」境內的治安而時時要受義勇軍的威脅，然則日本如再欲造成與「滿洲國」同樣的第二第三偽組織，至少也須派出二十萬陸軍，纔能對付得過。日本常備兵額總計不過十七個師團，全數調來尚且不敷，國內與朝鮮治安的維持鎮懾，也還須相當的兵力，至此勢必徵調及於預備役及後備役。如此則日本就是與中國正式作戰；與中國正式作戰，就不是我上面所說，僅僅控制中國北部的範圍以內的事。這樣他就要以主戰場為主戰場，就要完全拋棄他的主目的敵。日本如出此下策，就不啻自取敗亡。此種有意義的犧牲，將非中國之所畏，且無甯為中國之所樂受而不辭。

(三) 日本如以任何理由對中國正式用兵，中國的武力比不上日本，必將大受犧牲，這是中國人所不容諱言的。但日本的困難，亦即在於此，中國正唯因為沒有力量，即是其不可輕侮

的力量所在。戰爭開始，在勢力相等的國家，以決戰爲戰事的終結，但在兵力絕對不相等的國家，如日本同中國作戰，即無所謂正式的決戰，非至日本能佔盡中國每一方里之土地，徹底消滅中國之時，不能作爲戰事的終結。兩國開戰之際，本以佔領政治中心爲要着，但在對中國作戰，如以武力佔領了首都，制不了中國的死命。（因中國尙在革命未成的時期，俟下面再詳論之）日本至多也不過能佔領到中國若干交通便利的都市與重要的海港，決不能佔盡四千五百萬方里中國之全土。中國重要都市與海港全被佔領時，在中國誠然將陷於極度的困苦與犧牲，然日本亦何嘗能澈底消滅中國之存在？即就東北四省被佔爲例，在中國國家喪失此重要之領土，當然爲一極嚴重之損失，但以革命期內的國民政府的性質視之，一時的得喪幾無關係，且無庸謂塞翁失馬。蓋吾人曾聽到中國國民黨當局說「收復東北，革命黨當然應負其責任，但失去東北，革命黨不負其責任。」作者不是國民黨黨員，對於此語，不欲斷言其是否爲國民黨自圓其說。事實上東北在九一八以前，僅名義歸屬於國民政府，而軍權政權財權，儼然獨立，至少可說非革命勢力範圍以內之地，不過從前是有名無實，而今則並喪其名，但表面雖屬淪亡，實際自東北被佔以後，東北軍隊反得因此而完全統一於中央，東北人心，亦澈底認識民族主義的意義，精神上更密切歸屬於統一的中國之下。就此段的證明，可以知道日本若以繼續侵畧剝削中

國疆土爲得計，其結果不過使中國踵行放棄歐洲退保亞陸時的土耳其的先例，縮短戰線，出死力以爭生存，彼時兩國人民的生命犧牲，慘烈不堪預想，但兵連禍結，日本畢竟能否達到徹底消滅中國的目的呢？

由於上面幾點，可見日本無論爲對俄對美備戰，或爲遂行其五十年前傳統的大陸政策，而出於武力壓迫中國或侵畧中國之計，在日本立場上，決然爲犧牲極大而毫無把握的企圖。換言之，不論控制中國，或消滅中國，皆爲不可能，至於國際上側目而視，以及日本內在的危機，我此文已不用贅說。日本國內現在也有不少有識之士，十分憂慮於日本之將來的，但以我所見，日本實在沒有非孤行到底不可的理由，如果撇開成見，認清事實，要改弦更張，那就回頭是岸。

國際上大錯的鑄成，有主因也有副因，往往不止一方有錯誤而必是雙方均有其錯誤。我們綜觀自九一八前後以迄於今，不論中國方面或日本方面，均有其對大勢及對彼我認識之錯誤以及措置上的錯誤，這些錯誤有已成過去的，有繼續仍循着錯誤之路而還不斷製造新錯誤的，本文既欲忠實的檢討中日關係，當然應將兩方所有的錯誤，一一指出，而後可定應採取的解決的途徑。

四 中國方面之錯誤與失計

十

中國方面對於造成如此巨大事變，雖然不能與日本負同樣的責任，但回溯九一八前後以至今日，造成如此難解的僵局，中國實不能說一無認識上或舉措上的錯誤，這種種錯誤，有屬於政府的，有屬於民衆的，有政府與民間所應共認錯誤的，現在概舉如下：

(1.) 失却時機的錯誤 當民國十九年以前，我們也曾聽得國民政府有解決商租權問題的傾向，彼時日本還沒有簽認關約，一切懸案尙在待決的時期，後來聽說因爲國民政府內部意見的不一致，把商租權問題攔起。本來日本對國民革命，疑阻百端，中國國民黨引不起對日的好感，是無怪其然的，但國際之間，友敵何嘗有一定刻板的標準，苟利於國，應屏絕嫌怨而爲之。可惜當局無此勇氣，坐失良機，否則彼時日本軍人派尙未抬頭，政黨威望，也未減低，兩國關係或可藉此好轉，九一八事件的誘因，亦或不致發生。及至九一八事變既起，彼時中國輿情昂奮異常，但也有一部分人燭及危機，主張相機及早解決。例如胡適之先生等即有不惜依據日本所提五項原則，毅然直接交涉的主張，當局終於遲迴却顧，堅持不撤兵不交涉之原則，致使日本緩和派不能抬頭，軍人氣勢日張，問題愈陷僵化。就是瀋陽陷落尙未侵入關內的時候，也還有使日本止於錦州以徐圖轉換局勢的可能，可惜步步錯過，以造成此後不可收拾的局面，

這不能不說當局沒有決心及不負責任之所致。

(2.) 不徹底實行革命方畧的錯誤 上面這一段話，或者有人以為事後論人，失之太苛，中國對日仇恨，造因既遠，深刻普遍，再加以如此突然的重大刺激，當局縱欲委曲謀國，何能抑制人民的反感，而免內部之不安，殊不知我們所言，乃以責望於以革命救國自任的中國國民黨。所謂革命外交之不同於通常外交者，即在不被動而能自動，不固執而能因應，應剛則剛，應柔則柔，能伸則伸，當屈則屈，完全以變動不居的方畧來實現不可變易的目的，史例具在，豈不聞列甯力排衆意與德國言和的往事。乃左支右絀，陷於既不能強又不能弱的地位。我們回顧九一八以來的經過，縱不言當局無挽回危局之意思，要不能不認為缺少當機立斷的勇氣。於此吾人愈益追思國家當艱危之際，尤需要有大之政治家，今中國國民黨當局既缺真誠，復乏智勇，結果自陷於進退不能的僵局，雖欲不謂為負國負民，亦何可得！

(3.) 判斷對方的錯誤 九一八事變發生以後，中國國民對於日本情形之判斷，謬誤不止一端。當時一般見解，以為中國兵力雖不如人，而抵貨運動，即可為代用之武器，所以對日萬不可妥協，祇要抵貨運動支持一年半載，日本國內必大起經濟及政治上之騷擾，雖欲放棄東北而不得。殊不知中國欲自固抵貨運動的陣線，已將費甚大之力量，受很深的痛苦，而同時又

沒有看清楚日本支持能力的久暫，以及其軍國主義支配下的國民心理，這是一種很大的錯誤。再則中國在九一八以後，還以為日本雖肇此巨禍，畢竟不能不顧慮國際的反感，也不能完全拋却對國際條約的責任，而豈知日本這一個國家，為獨霸太平洋混一東亞的野心所驅使，處心積慮，早已視國際條約為具文，而且認各種條約為束縛其野心發展的鎖鍊，本不能以守約守信義的通常國家相看待。中國當時並且有一部分人以為侵佔東北祇是日本軍閥的主張，民間開明的輿論，必能抑制軍人的猖狂，所以當時中國輿論，還紛紛揣度民政政友兩黨勢力的消長，以為因應之標準。豈知日本並非通常政黨國家或立憲國家而為一種由特殊階級的軍閥把持一切的特殊國家，這種錯誤到後來日本脫退國際聯盟及五一五犬養白書被刺以後，亦已完全證明，但在當時，確甚流行。

(4.) 審察自力的錯誤 中國當時不但不知彼實亦不知己，對於自身力量，不是誇張太過，就是信賴過甚。祇判斷敵人的缺點，無暇反省亦無意承認自己的弱點，一般人民激於義憤，甚至自信短刀可以制飛機，單靠無近代配備的陸軍，可以參加現代的戰爭，高呼宣戰，力促出兵，使當時政府解釋無從，因應不易。這種虛憍的呼喊，暴露自身外強中乾的弱點，適以張日本軍人的氣勢，固可嘆惜，其實也不僅民間觀察錯誤，就是政府判斷彼我情形，也有矛盾錯誤

的所在。當時軍事方面，在日本發動侵入熱河之時，過信東北軍隊爲有利用險要相當抵禦的力量，以爲日本如不從他國內再運六師以上的兵力，決不敢侵入熱河，初不知東北駐守熱河之軍隊，精神實力，頹敗至此，這是審察自力的錯誤。

(5.) 觀察第三者的錯誤 中國當時不但對彼我兩方缺乏真切的認識，即觀察第三者的實情，亦不能盡得其真相。當時中國自政府以至人民，總以爲國聯盟約具在，日本爲盟約國之一，如其悍然不顧，聯盟必能依照約章，實施經濟的制裁，同時又以爲英美或其他國家，如友誼的斡旋無效，亦必能爲保障盟約尊嚴，或保障世界和平，起而作有力之干涉。不知英美諸國，方各有本身之困難，蘇俄亦正埋頭作外交內政之準備，顯然不能有積極的行動。世界經濟凋敝之秋，各國愈惴惴於和平之破裂，日本愈無顧忌，其後英美諸國之干涉固然不見事實，而國聯除幾次決議以外無表示，除所謂道德同情以外，亦更無力量。當時這種判斷的錯誤，三年後的今日，也已證明。

(6.) 內部凌亂的錯誤 中國方面彼時一方面既以虛驕不能自掩其弱點，同時復不能固守外交之秘密，往往政府尚未決策，民間已自喧騰，一舉一動，世界咸得窺見其隱微。實力上頃刻之間不能強，而體面上又種種牽制不能弱，中國愈表示其虛驕，日本軍閥的氣勢愈盛。中國

對於日本之着着逼進，既恥辱又憤恨，自祇有訴之於世界的公道，而日本的當局，遂以中國信賴聯盟及期望英美的事實，向日本國民高呼「中國襲用以夷制夷的政策」以激刺日本國民的感情，使開明派的主張愈見沒落，而事變擴大更無止境。其時中國內部，當局與人民不相一致，人民各派間不能一致，中國國民黨與黨外不能一致，甚而至於中國國民黨內部，更於此時因外交主張而顯現分裂，因之內亂與外患益見嚴重，吾人回溯往事，真覺不忍畢言。

(7.) 感情用事的錯誤 以上所舉認識上及判斷上措施上種種錯誤有許多已成過去，也還有一部分沿襲未改。關於造成過去局勢的種種錯誤，已無須乎追求，所重祇在自今以後能否不再沿襲從前觀事不審，決謀不勇的錯誤，吾人默察國內，此事亦祇能作為一種之期望而目前尚難為肯定。作者上文已明言中日僵局必須打開，吾人明知中日問題主動完全在日本，打開僵局的第二步，必先日本有覺悟之誠意與放棄侵佔的表示，但日本如果表示欲開始交涉時，中國方面恐尚有不能贊成直接談判者，中國受此空前的屈辱與侵侮，感情之激張，自是意中之事，但吾人認為「同歸於盡」的辦法，決不是辦法，日本如橫行到底，中國自然應該出死力以謀掙扎，凡在國民，誰不同感，但「死中求生」畢竟是最後無其他辦法時的辦法，如果能從「生裏求生」總應該抑感情以重理智，為國家民族計及於久遠。此一觀念如不解放，恐中日僵局，亦尚

留多少障礙，不能徹底打開，長此以往，一味的因循僵持，終非國家民族之福。

五 日本方面的錯誤（一）……………直接的對中國認識之錯誤

論到造成事變以迄今日不能打開僵局的原因，日本方面的錯誤，較之中國方面的錯誤當然更多。日本方面首先對中國的認識陷於根本上的錯誤。基於此種根本錯誤的認識，而下判斷作打算，於是有種種計慮上的錯誤。同時又因為造成事變以後，一迷不復，為因應國際而其所採取的手段，亦陷於錯誤。現在且先說日本對中國認識之錯誤：

（1.）對中國目前國情認識的錯誤 我前文會說日本沒有方法消滅中國的存在，其最重要的理由，即中國現在方在革命期間，在革命未成期間的國家，與通常已有強固而確定的組織的國家完全不同。日本人以通常國家視方在革命中的中國，與中國人以通常國家視軍權支配下特殊的日本，其錯誤正復相等。在通常已有固定組織的國家，誰都知道其要素為「土地人民與主權（或政府）」，但近世革命的史例，已詔示我們在革命期中的國家，與通常國家完全不同，其要素則為「主義，領袖與羣衆」。這三個要素，論羣衆，則中國有廣大的人口，而因外侮的緊迫造成了許多民族意識堅強的愛國之士；論主義，則中國近七八年來三民主義畢竟已成爲舉國

一致的國是，中國人容有不同意於國民黨當局的措施，但絕少有反對三民主義者，中國的智識階級，現在已公認唯有鞭策國民黨努力自愛，中國始可以對外；而自九一八以來，在事實上中國已造成了一個可以提挈全國國民的黨及其事實上的領袖。所以只要主義普遍深入，領袖健全存在，羣衆一致擁護，一時政府的成敗或土地的得失，轉成爲次要問題。中國國民政府現在本自命爲臨時革命政府，而非革命完成後的政府，所以我上文說，佔領了中國首都，不能制中國的死命，如果不能消滅他的領袖，則領袖之所在，即中國政府與國力中心之所在。日本人以爲軍事行動繼續進行，疆土日蹙，中國便不能生存，豈知革命期中之國家，不可以尋常國家相視。中國國民黨當鼓勵國民「已失之東北四省應認爲一九二〇年以前俄國之西比利亞」，我不是黨員，對此語不願下判斷，但中國尙爲革命期中之國家，則爲不爭之事實。由此以言，如領袖依然存在的時候，日本人沒有澈底消滅中國的把握，只可惜日本的中國通，對於中國事情，平時一切調查觀察，異常精密周到，而獨忽畧此重要之一着。

(2.) 對中國歷史與時代認識的錯誤 日本人自命能通中國的歷史，以爲漢族爲主的中國，在六百餘年前可以亡於蒙古人，在三百年前亡於滿洲人，何嘗不可於今日亡於日本人之統治，此又爲一種觀察之錯誤。因在宋末或明末時代，中國人民除少數儒者外，幾直不知有更易朝

代，或少數民族入主中國的一回事，但在二十餘年前推翻滿清的時候，則不僅革命先覺起而奔走，也有多數民衆參加其間，滿清統治的推翻，是同盟會「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四句口號所號召，辛亥革命在中國歷史上劃一顯明的時期，與從前易姓改代截然不同。自此以後，至少人民已了解民族主義的意義，至於今日全國在學的大中小學生一千二百萬是具有深固的民族意識的，加以前清以來，凡是識字的成年國民，以總人口百分之十計算，也有四千八百萬人，皆知道亡國是怎樣一回事。就以日本吞併台灣朝鮮爲例，在三四十年前，或者中國多數國民尙不知台灣朝鮮與中國有怎樣關係，因而不感痛癢的，在今日有許多地方，即在田夫野老，也知道東北四省被佔的事實，這不是任何力量，這是時代變遷的結果，即使以六千萬人來說，其數量也已與日本總人口數相近，日本的武力雖強，終不能除盡此六千萬具有充分民族意識的國民，而使全中國帖然服從日本作順民，所以拿宋明亡國史例來推斷今日之中國，實又是一種錯誤。再則日本人觀察中國歷史，往往祇從壞的方面去找中國的缺點，而不從好的方面去研究中國民族的特性。中國歷代以來所以能屢蹶屢興，不受制於外族，就因爲中國有見危授命的民族精神和累世相傳的所謂天地間之正氣。這種精神和正氣，在危亡未運之際，常藉忠臣志士可歌可泣的行爲來表現，而歷代師儒遺民著書倡導，播之歌謠戲劇，成爲中國主要

的社會教育。這一種遞相傳授的教育，根基異常深厚，幾乎中國人的血液中先天就多少帶些這種教育的影響。卽如近代中國的主要人物中，也還有常常引用諸葛武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鈍，匪所逆覩」以及「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等說法，作爲砥礪志節的格言。所以日本人不應該祇看見宋明亡國時的情形，而不看見元末和清末中國民族再起時的情形，不應祇看見有宋朝的秦檜張邦昌，而不看見岳武穆與文文山，不應祇看見明末的洪承疇吳三桂而不看見史可法鄭成功。到了近二十年民國時代，日本一般後起的中國通，更不應祇看見袁世凱等帝制自私的軍閥行逕，而忽視了孫中山先生等革命救國的犧牲精神。要知道這種精神和正氣，向來是瀰漫於中國民族之間，更加以近代民族主義的灌輸，使這種精神更有所寄託而爲更大的發揮，所以觀察中國民族，決不能以少數無恥軍閥官僚作代表，而以爲一概可以威脅利誘的。這一層意義，在日本新進的「中國通」，實在太不瞭解，但日本現存的老師宿儒中間，還不少通曉東洋史實，瞭解中國民族的老輩，倘以此義相質，一定許作者之言爲不謬。

(3.) 對中國國民黨觀察的錯誤 日本方面還有兩種錯誤的見解，其一以爲中國國民黨是發動排日勢力的中心，其二以爲非打倒中國國民黨則中日問題無法解決，日本不能安枕，這又是根本的錯誤。我在本文開始時已說明：在中國，講明中日兩國唇齒相依的道理的，要算國民

黨總理孫中山先生爲最澈底。依理而論，日本在國民革命發展之時機，正是清算兩國過去不快之關係，而澈底更新國交的絕好機會。在民國十六年以後的國民黨，明白放棄容共政策，尤其沒有使日本害怕的理由。吾人從國民黨歷史及其人物之分析而觀，實在看不出有排日成分之存在。平心而論，一個擁有百萬以上黨員的黨，其黨內各個分子行動之不能絕對一致，恐怕在世界各國皆然，伴於中日感情之惡化，國民黨黨員與一般國民懷抱同樣對日怨望之心理，當然不免，但國民黨的幹部人員，自孫中山先生以下，與日本公私各方有友誼交往與智識交換的，不在少數。所以在中國言，能理解東亞存亡關鍵，能理解日本並能理解中日應平等提携而不該交惡以兩敗的，國民黨向來的理論是比較清楚的。即以近事而論，日本試一翻閱一九三一年以前的對華輸出貿易額，並檢取一九三二年以後各年的對華貿易額，而視其消長之數，即可見日本對華貿易數量顯出逐漸恢復的趨勢，（日貨輸華的數目，僅從海關統計，不能完全表現），即爲國民黨當局不願兩國關係更趨緊張之政策的反映。中國現在正有一部分國民對國民黨此種綏和政策，深致其不滿。余敢言國民政府如放任人民排日，兩國關係益見緊張，固不待言，而日本在經濟上之損失，必將不可以數計，所以日本如認國民黨爲策動排日中心，斷然爲一種錯誤。其次中國國民對日感情之惡化，一步一步都是日本自己所造成，決非國民黨宣傳鼓勵之所

能致，若謂日本不自動改善中國之政策，而祇以排除國民黨爲消弭反日氣勢之手段，則我敢代表非中國國民黨員之一般國民，直認日本此種觀察爲謬誤。日本近來的用意，不知真如其表面所云爲消除排日而要打倒國民黨呢？抑或認定國民黨爲使日本不能絕對支配中國之障礙而要打倒國民黨呢？無論由何種方面說，中國國民黨在此十年以內是沒有一種力量所能推翻的。試看在九一八以前，中國國內，還不少有反對國民黨與蔣氏的呼聲，而自日本侵佔東北以後，外侮日深，國民黨之根基反愈見鞏固，至今反對國民黨與蔣氏之言論行動，轉見其減少，國民黨內部之支離破裂，雖依然深刻，而國民則因日本傾力欲打擊國民黨，反從而表示其同情與愛護，這豈不是一個極顯明的例證？且中國國民黨之能存在於中國，自有其必然的理由，換言之，其存在的根據不全在於其本身，而無甯謂寄於客觀之形勢。國民黨內部之一盤散沙，無可爲諱，其組織與精神，違反近代式的地方也很多，甚至於各爭意氣，自相殘害，即其內在的矛盾，實屬不勝枚舉，但外人欲以皮相之觀察而斷定其運命，則爲不切於事理。試觀民國二年以來北方軍閥迭次假助外國最強的力量以謀消滅國民黨者，無所不至，而每次壓迫的結果，轉使國民黨的勢力益見擴張，雖以最陰鷲的第三國際共產黨，亦不能達到消滅國民黨的目的。民國十五年三月以後，蘇俄鮑羅廷且自謂沒有看清楚國民黨內有如此堅強的人格，至於今日，則更非任何

外力所得而推翻。因國民黨今日所以能屹然存在，是依於三種的因素：一爲歷史的使命，有中國如此之歷史，即必然有中國國民黨。二爲時代的使命，在今日的世界與時代，就必然在中國有担负時代使命的國民黨。三爲民衆的心理，因中國處於如此情況之下，民族意識就自然要求有一個領導中心的力量和組織。所以無論國民黨決不能推翻，即使推翻以後，中國也還必然的有領導民族對外的一種組織，無論國民黨的領袖不能消滅，即使消滅以後，也還必有第二第三的或者更爲堅強有力的領袖繼之而興。由此推論，如日本尙有此種誤解，以爲祇須推倒中國國民黨或打擊其領袖而使之沒落，則中國即無對外之中心勢力，此實倒果爲因之論，即如日本人之意，中國國民黨的統治將不勝外力之壓迫而崩倒，然國民黨目前之困境，爲以一種革命的組織而正面當國家之難關，受了政治責任上的牽制與束縛，遂到處表露其竭蹶矛盾之態，一旦不居於政府地位，拘忌一空，行動自如，則其對外的力量必較居於政府地位時爲尤大。日本必能明悉窺伺於中國國民黨之後者爲何種勢力，此種勢力之抬頭與東亞將生如何之影響，且國民黨既居在野地位以後，其百餘萬黨員及所能支配之軍事力量，被迫而不顧一切的手段，日本亦不難想像其結果爲如何。所以日本如真爲其本國利害着想，此種謬誤，應當要根本糾正。

(4.) 對中國當代人物認識之錯誤 對於人物的觀察和分析能力之強，這是日本人所向西

方人自豪的。但對於中國主要人物，吾人殊未見日本人能認識正確。即以日本外交時報等刊物屢次對於蔣氏之論評爲例，在日本人的評論中，常以蔣氏與中國過去人物如袁世凱李鴻章等相提並論，這真是擬於不倫。袁世凱及李鴻章在中國歷史上有其各自的地位，此處不必加以討論，但蔣氏與袁李所處的時代，至少相隔一世（在中國以三十年爲一世），無論其出身不同，教育不同，環境不同，卽其所處之時代，尤絕對不同。袁李兩氏是帝制時代或科舉時代出身的，蔣氏自幼年時代，卽已參加革命組織，以後三十餘年間，在人生可塑性最豐富的期間，始終不曾離開革命的事業，其教育其思想可說一手由孫中山先生所陶鑄，其生涯始終沒有脫離過革命的環境。吾人不認世界有所謂超人，每個人都受時代環境的影響，蔣氏之爲蔣氏，完全是在革命環境中成長出來，可說其血液其腦筋中沒有一點前期帝制時代的意識習性之遺留，蔣氏與袁李之間的距離，可說是一個近代民國與幾百年前專制國家間的距離一樣，是屬於完全不同之兩個時代兩種型式的，今以蔣氏與袁李兩氏並論，以袁李的習性與識解來推斷蔣氏，真如中國古語所稱「老子與韓非同傳」一樣的滑稽。我所以斷言日本人對蔣氏實在沒有認識清楚，因爲沒有認清時代與人物，遂欲以從前所施於帝制時代遺留人物的方法，施之於現在，而希望得到同樣的效果，這是不言而知其不可能的。我在此處且舉一例，我非中國國民黨黨員，當然不知國民

黨的對外方畧的內容與底蘊，但知國民黨之所謂對外的革命方畧，是有其特殊一貫的策畧的，當濟南事件以後，曾聞國民政府主席譚延闓責問當時的軍事統帥蔣介石「既要死守濟南，何以撤退北伐主力之兵？若要放棄濟南，何以又留一團兵力來死守濟南城，而最後又命其退出？」蔣氏答稱：「這就是我們革命軍的戰畧，第一當然要表示不屈服的革命精神，並且表示濟南是日本兵力強佔的而不是中國自己放棄的。第二是要顧到革命的全局，不能牽住北伐的進行。第三是要保存中國軍隊，不作無意義的犧牲，只要濟南抵抗到三天之後，日本強佔行爲已暴露於世界，則目的已達，所以到後來仍命死守的一團冒險撤退，且使外間知我們要以一團人的力量，來對抗福田整個的一師團的兵力。」吾人觀察蔣氏對日本用兵，自上海，長城戰役，以至最後退出密雲之抗戰，可說都是濟南事件以來之一貫精神，這至少可以表示革命軍力量所在地，不能無代價的放棄，日本欲以唾手而得瀋陽的先例，應用到全中國，到底爲不可能。我們一再研究蔣氏對日本外交方針，回想到他民國二十一年一月間所發表的意見書，就可以看出他的主張對日本外交是「不絕交，不宣戰，不講和，不訂約。」他這箇外交政策是與他對日戰畧之所謂節節抵抗的消耗戰術，與堅強不屈變動不居的革命戰畧，是完全相應一貫，始終不變的。然而這種政策並不是徹底的，國內當時亦曾有人極端反對，但由今追昔，不能不說這個政策比較

是無法之法，因為國力兵力絕不相等的國家，只可用這個政策和戰畧與之相周旋。日本如明白這個道理，應知日本若再欲以武力威脅中國而得到屈服的結果，可說是不能達到目的。此並非革命當局有如何突過前人的本領，就因為時代不同，從前帝制時代或軍閥時代，遇到危險時期，就因為當局者有保全自身利益名位的觀念，不能不畏怯而屈服，現在中國革命期內民族意識的高漲，已絕不容當局有一毫之自私，既然抱定「與國同殉」與「死而後已」的觀念，還有什麼畏怯顧慮的地方？中國方面採取這種「時時可死，步步求生」的革命戰畧與方針到底，相持不下的結果，也必使日本同歸於盡。

(5.) 忽畧中國國民心理的錯誤 由日本近來對中國所取的種種步驟而言，不能不說「相煎太急而相知太疏」。日本人一面造成中國國民絕不能與日本妥協的錯誤的前提，因而認為唯有消滅中國民族，日本纔可以安枕，而且認為消滅中國，非出以極毒辣之手段，使萬劫不能翻身不可。關於第一點，我敢斷言中日之間並沒有絕對不能轉圜的情形，此不必遠徵其他，即就中國對於英國來說，中國國民對於帝國主義的侵畧，當然要竭力掙扎以求得真正之獨立平等的，英國為帝國主義領袖的國家，對中國一切不平等條約，又是由對英鴉片戰爭而起，英國其始以殺人的毒物害我，其繼以不能擺脫的鎖鍊困我，這是中國國民深入骨髓的仇恨。若說中國國

民自二十一條以來對日交惡有十餘年的歷史，那麼對英交惡就有八十餘年的歷史，但是在今日中國，可以說反英的感情並不如何濃厚，這固然因為英國近來已改變鴉片政策，最大原因則由於英國近幾十年來對中國沒有土地野心，所經營的祇在商業經濟方面，所以祇要許多不平等條約得以改正，中國是願與英國為經濟的互利而與之友好的。日本人所要認識此一點，便知道中國沒有百世不可解的仇恨觀念，而好惡友敵，完全可以事實相轉移。日本如真能放棄土地侵畧的行為，中國對西方各國，尙且願引為朋友，何況同洲同種之日本？但日本為東方民族，應明瞭東方心理，東方人的特性，尤其是中國人，就是重感情，重氣節，重禮貌與道義。今日日本以佔領中國土地極端傷損中國感情與尊嚴，復為防制中國復仇而施以違反道義的行為，中國即欲與日本提攜，亦何能忍受此種屈辱形態下之提攜？日本人唯其對中日關係看得太悲觀，以為絕無挽回希望，所以日本為猜防中國，要置之死地而後快。在這個方針之下，日本人一方面則用種種方法使中國疲於奔命，不但使用兵力，而且直接間接放任莠民擾亂中國各地的法律秩序，破壞中國的善良風俗，以制中國目前之死命，在另一方面，又不惜用極殘忍方法，企圖殘害並斷絕中國民族將來之生命，中國各地海洛英的販賣，多由日本商民經營，至少日本官憲是放任的。中國受鴉片之害，民族健康已受斲喪，至今對英國，雖恢復感情，但此一仇恨，百世亦難

磨滅其痕跡。日本現在踵行其事，毒害愈烈，將使中國世子孫永難忘却。日本爲消滅中國復興力量，現在並且假手於各地無知漢奸或軍閥官僚，來仇視並加害於中國知識分子，不知中國知識分子永難除盡，而日本此日利用最下等之漢奸，此等漢奸，將來亦即爲日本之大患，出爾反爾，其道正復相同。且日本所深惡者爲共產黨之方法，所標榜者爲東方民族之特性，現在日本常常想利用中國過去的無聊軍閥官僚，在各地造成日本式的政治，或成爲日本傀儡的政權，此事正令中國人民回想到從前第三國際，想在武漢，廣州造成俄國式政治的情形，畢竟廣州或武漢至今尚存有這類外力強造的政治痕跡沒有？還不是因爲民衆共憤，起而驅除，歸於曇花一現？吾人敢正告日本，凡是有特性有國家意識的國民，最難忍受的行爲，即爲欲消滅其民族性與歷史文化。東方民族爲講道義的民族，東方人應尊重東方的習慣思想，凡是違反道義，出以暴力強制而近於虛偽殘酷的辦法，都不是東方人所能容忍的辦法，日本如不欲在中國種下世代的深仇，我以爲應平心自反。

總之，日本的錯誤，在乎以通常國家視革命期中的中國，在乎誤認二十世紀爲十八九世紀而依然採用前世紀的手段或傳統政策，在誤認革命勢力而視同帝制時代之遺留，在以對待官僚政治的手段而對付革命策畧，而不悟日本之武力壓迫，只能脅制無知識之官僚軍閥，而不能屈

股民族主義正在發達之國民。在另一方面，對於兩國關係的惡劣又認為太悲觀，而不悟迷途未遠，只要拋棄武力與土地侵畧，兩國國家間與人民間關係之好轉，實大有可能。

六 日本方面的錯誤(二)……………間接的舉措上的錯誤

以上已備論日本對於中國認識的錯誤，現在願進一步指出日本在對付國際所取舉措的謬誤，因本文為討論中日關係而作，故祇以由對中國問題而引起者為限。

(1.) 脫退聯盟而孤立的錯誤 日本對中國既造成一發難收的形勢，於是一方面則拒絕友邦的勸告，一方面則排斥國聯的決議，甚至不惜脫退聯盟，出於驚人的舉動，在日本以自己說明的結果，即為日本有獨自之立場。但吾人局外觀察，日本口頭上以獨立為標榜而實際則得到孤立的結果，實在就日本以言，獨立則可，孤立則不可。現在世界的趨勢，為國際合作的趨勢，幾乎沒有一個國家願意孤立於國際集團以外。譬如對於國際聯盟，蘇俄以主義不同的國家尚且斷然加入，美國也放棄其傳統的不合作政策而傾向於加入國聯，今日日本乃適在這個時期退出國際集團以外而願意孤立起來，溯其原因，由於欲貫徹佔領滿蒙混一東亞，與獨霸太平洋的政策所致，而不知完全陷於違反時代趨勢的錯誤。世界上祇有一般革命未成的弱國，不得不主張獨自

立場而願意孤立於國際集團或條約以外，因國力不等，加入以後不能取得均等的地位和利益，只有義務而沒有權利，甯以不加入爲得計；若在已有基礎的國家，斷沒有自願孤立於國際以外的。日本在脫退聯盟以前，謀及重臣，咨及學者，可知也認爲問題嚴重，但欲罷不能，最後終出於毅然之一決。自從廣田登台以來，雖然自命以各別折衝代替國聯的束縛，但日本既不惜投一重大之暗影於世界和平之上，在此國際關係日益密切之時，自己造成舉世側目的地位，終不是日本國家的福利罷。

(2.) 亞洲門羅主義的錯誤 吾亦仔細觀察三年來日本的舉動，便知道日本人要以對外雄飛獨霸的企圖，渡過國內的難關，而第一步則要做到亞洲絕對支配者的地位，從而對內對外，時時發露其東亞門羅主義的抱負。但吾亦終認爲一九三五年的今日，與一八二六年美國高唱門羅主義時代不同，不但時代不同而情形也絕不相同。因爲英國與法國彼時在美洲還沒有如何了不得的深切利害關係，加以地勢上遠隔重洋，彼時交通工具與技術沒有像今天這樣進步，所以任令美國人高唱美洲人之美洲而實際以一國支配兩大洲的政治與經濟，但事實上美國在現在也不得不放棄當時門羅主義的政策。現在日本如果爲便利控制中國而高唱亞洲門羅主義，則在中國尚未脫離次殖民地的地位以前，歐美諸國對中國是有錯綜複雜而且極深厚的政治和經濟利害

關係，甚至在軍事上也有深切的影響的。日本此時欲排斥列國，以東亞人之東亞的口號而置中國於絕對支配之下，如此不僅美俄已敵視日本，歐洲諸國都要敵視日本，尤與英國利害極端相衝突。美國控制全美洲是與英國獨立戰爭以後而取得支配者的地位，日本的強大，則是受英國保育的結果，這是日本人，亦是英國人所不能忘的。今日日本若悍然不顧，而以東亞主人自居，其結果非造成世界之上全是日本的敵人而不止。

(3.) 自造錯覺的錯誤 日本爲鼓勵鞭策其國民，統一其國內的輿情，從前既以種種誇張不實的理由，指滿洲爲日本生命綫，九一八以後，更以日本生存受到威脅爲詞，辯解其侵略中國爲不得已，一面更向日本國民狂呼其空前國難，不思此種國難，卽或有之，亦爲日本所自己製造的，如欲解除，易如反掌，只在日本心理一轉移之間。日本常指中國施行排日教育，實際中國除敘述國恥歷史以外，並沒有如何深刻的排日教育，而日本則自造錯覺，對其國民普及深刻排華的心理，幾乎要在每個日本少年與兒童的思想中注入「有中國即沒有日本」的心理，這樣爲達到一時國策之方便而製造普遍深入的幻覺，必有極嚴重的後果。吾人就事實而論，日本如果真正顧到其生存發展，照現在的做法，可說適得其反的。因日本如果不能整個消滅中國，使無一人之存留，則今日的悍然不顧，決不能如從前之滅亡朝鮮時代。朝鮮亡後至今三十年，

然朝鮮人民今日猶不能說真正歸屬於日本。現在對於中國，如其侵略到底，永久佔有滿洲，或再擴大範圍，一方面再以另星宰制的辦法，置中國於死地，則中國人民豈但三十年，即三百年亦不會忘却，如此在緊接近鄰的中國種下百世不解的深仇，這纔是日本百年存亡大計上的威脅。反之日本如果真有自動更新國交的誠意，則日本國民生存上之困難問題，正不難於解決中日懸案，確立中日關係，保持東洋平和上謀取極合理的解決。中日兩國地理民族既相接近，風俗習性亦畧相似，祇看兩國國民通婚者家庭關係的美滿，以及中日普通商民間相與來往之親切融洽，可見本爲兄弟，無不可合作之理。日本維新時代自強自立的好例，給與中國覺醒的國民以不少的鼓勵，日本在學術文化產業經濟各方面優越的成就，中國方面並不否認日本爲先進。中國今在復興建國時期，需要經濟文化之提携正感迫切，而日本人刻苦勤儉的習性，又適爲中國所易與合作。日本之所缺乏，在中國或見爲過剩，反之日本之所能供給，或適爲中國所需要，所以在經濟上言，兩國如真能以平等互利相提攜，兩國民族生存發展上之問題，便可以完全解決。平心以思，實在沒有相扼相制以同趨絕滅的必要。

七 中日兩國所應認識之要點及應採之途徑

明白了我上文所說的中日兩國的諸般錯誤，便知道事變演化，以至造成僵局的原因，而僵局的不可再令延長，則又不待贅言。錯誤的反面即爲真理，祇要由上文所舉的幾點在反面上推尋，便可以發見中國與日本應認識之點，及其應取之途徑，上文所論已極詳明，所以祇須概括的舉出如下：

中國所應認識及應取之途徑 打開中日僵局的主動，當然在日本，但假定日本誠意表示時，中國方面應該怎樣？我以爲中國所應認識者：虛驕不是辦法，拖延不是辦法，僵定不是辦法，期望或倚賴他人不是辦法，爲感情而犧牲理智也不是辦法。過去的事，就誤於虛驕，所以今後舉國上下應認清事實，自己的將來應有自信，自己的弱點不可忽視。再則國家民族的生命是千年萬年的，一時的榮辱得失，祇要不礙及根本，在歷史上也是常見的，所以祇要日本有誠意謀解決，中國祇須要求放棄土地侵畧，歸還東北四省，其他方式，不必拘泥，過去懸案，應以誠意謀互利的解決，一掃國交上的障礙。人民應洞明大義，不作苛求，當局應忍辱負重，掬示忠誠。至於期望國際間發生波瀾，以爲中國可乘此以求收穫，則須知日本戰勝非中國之福，日本戰敗以至於滅亡，也非中國及東亞之福。目前日本自倫敦海縮談判破裂以後，四面楚歌，已成衆矢之的，完全陷於孤立的層圍中，因此也有一部分人，以爲多行不義，終必自斃，中國亦何

惜一時痛苦，甯爲瓦礫之場的比利時，亦使日本蹈歐戰時德國之覆轍而遭更大之慘禍，故爲中國計，處此形勢，更須堅持，且當長其驕矜，以觀其敵。作者之意，則以爲人類意義，不在相斃，而在共存，世界進步，應視正道重於意氣。日本今日之冥行不顧，有類於狂夫之趨井，吾人視之，孰不洞如觀火，然中國本其固有之道義觀念，唯有以自力掙扎圖生存，無取乎因人之利以就便，應知日本所爲，雖不惜以害人者害己，而中國則堂堂正正，秉持正義，救人兼以救己。如其形勢可能，且當爲日本開覺悟之路，不必存投井下石之心。如果不是日本逼迫中國同歸於盡，中國便應從生路中求生存，不宜隨狂瀾以俱倒，相牽率以共趨於錯誤。若說留得強敵壓迫的事實，可以鞭撻國民之志氣，依我看來，只要國民以昨死今生之決心力自振作，再不像從前散漫萎靡，自亂步伐，雖無外患亦可復興。至於飽受教訓以後還不脫觀望國際形勢或存倚賴他人的心理，則非但不智，亦適以表示中國之無志氣無覺悟。譬如現在仍有一部分人注意日本對九國公約及華盛頓條約之態度如何而隨之爲欣戚，其實須知所謂領土完整之保全及門戶開放等等，如須保障於國際的協定，這已是中國的大危險所在。列國之所以爲此約定，豈在爲中國打算，表面上無非是維持均勢，保護商業，實際上就是帝國主義所以處置次殖民地的唯一方法。如果中國不能以自力復興，還一味倚賴此等條約，則時勢推移，即可爲瓜分或共管的先

兆。須知日本目前的悍然不顧是要夷中國爲保護國，其要求爲獨霸，而歐美對於不能自強自立的中國，則其思想中之結局爲瓜分或共管，其口號爲利益均霑，由中國的立場言，無論爲獨沾爲均霑，都是國家民族不能忍受之危害。中國所能自爲計者，唯有依於自力，艱苦圖存，對於當前障礙，尤其與日本之間的葛藤，應該當斷則斷，速圖解除，而對於自強自存之至計，則不可絲毫懈怠，須知唯自己站得起來，纔是安全之保障。至若激於悲憤，動於意氣，襲用亡清末年的口號，以爲寧亡於歐美不亡於日本，則須知中國爲獨立國家，寸地尺土不能滅亡於任何國籍之民族。所以一切都似爲次要，唯一要求，卽爲保持國家獨立與完整。

日本所應認識及應取的途徑 日本所應首先認識者，第一應知有獨立的中國，始有東亞人的東亞可言，故第一要義應徹底扶持中國真正的獨立，纔爲日本百年不敵的國策，有獨立之中國以平等地位與先進的日本相提攜，而後日本爲能善用其「在東亞之特殊地位與利益」（廣田之言）中國亦可發揮其對東亞的使命。第二應知時代變遷，明治當年的政策，不復適用，爲徹底更新中日關係，應拋棄武力而注重文化的合作，應含棄土地侵略而代以互利的經濟提攜，應吐棄政治控制的企圖，而以道義感情與中國相結合。第三應知過去中日關係的緊張，中國方面如有十分之四的責任，日本方面至少也應有十份之六的責任，而九一八事件以來，日本爲貫徹

主張，更由中日間緊張關係而造成與國際間的緊張關係；此種原因，實由日本對遼遠而未實現的企圖太樂觀，而對於切近可能的解決，又太悲觀之故，吾人相信國際間動盪的風雲，如果中日問題有迅速的解決；至少可以廓清其一大半，而中日問題的解決，只須日本一念之轉移。日本如真能覺悟長此僵化以共趨危亡之非計，勿再以浮詞掩飾，勿再製造種種不實的理由，強作自慰自解之詞，即應切實表示其「保全中國統一」且「對於中國之獨立或利益絕不予阻礙且無加害意思」〔日外務省聲明及廣田談話中語〕兩語的誠意，斷然歸還東北四省，使歸屬於中國的版圖，一面解決中日兩國之間的懸案。這種交涉，當然應由日本率先提議，但無妨由兩國直接談判，定議以後，即由中國報告國聯，國聯為維持和平，必樂於接受，同時日本退出國聯的原因既已消滅，則應重新加入國聯，以消除因退出聯盟而引起的諸般困難問題的存在。如此中日兩國間的惡感，必可烟消，而世界上戰機緊迫的慘霧愁雲，也可立見澄清，世界人類，皆將受日本之賜，此於日本尊嚴及原來立場毫無損傷，而一面可免除後來無窮之荆棘，為日本計，唯此始為妥善的國策。

八 結論……解鈴還須繫鈴人

本文之作，既不是策士式縱橫的辯言，也不是專門家謹嚴的著述，在作者自信，並不夾雜有絲毫的偏見或成見，更沒有什麼忌諱，祇是平平實實的就兩國真正利害，也爲東亞局勢與世界和平作打算。所指陳的，沒有如何精奧的理論，實是一種平凡的庸言，但世界上真理之所寄，往往就在這些平庸的道理上面。兩國政治家如果有博遠的胸襟，和深切的識見，卽應不顧一切的排除障礙，起而實現上段所說的途徑，以打開今日的僵局。但是這個責任，幾乎完全在日本方面因爲問題的前半段姑且不論，後來一切解決途徑的阻塞，是日本拒絕一切勸告的結果，自此以後，第三國或其他機關，固然大家祇好束手，而中國方面既在國土被佔的屈辱狀態之下，也更無打開僵局的可能。我以爲日本人應知前路荆棘，皆由日本所自造，及此回頭，坦途立現於俄傾。中國古語說：「解鈴還須繫鈴人」，所以打破難關的責任，畢竟還須日本來承當。

總而言之，中日兩國在歷史上地理上民族的關係上，無論那一方面說起來，其關係應在唇齒輔車以上，實在是生則俱生，死則同死，共存共亡的民族。究竟是相互爲敵以同歸於絕滅呢？還是恢復友好以共負時代的使命呢？這就要看兩國，尤其日本國民與當局有沒有直認事實，懸崖勒馬的勇氣，與廓清障礙，謀及久遠的智慧了。



1 30